

台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之變遷[†]

Transitional Patterns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李大正*

楊靜利**

Ta-Cheng Li*

Ching-Li Yang**

摘 要

本文使用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以三個不同出生世代婦女的就業歷程，分析台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遷。結果顯示光復後的婦女勞動參與類型並沒有太大變化，「傳統型」與「中斷型」兩者合計佔了一半左右，反而「持續型」有下降趨勢；最明顯的變化是「傳統型」內的「從未工作者」的比例大幅下降。此一現象隱含著家庭仍然是已婚婦女生活的重心，就業在組織家庭前是必要的，一旦成家之後，工作即可以犧牲，至少是短暫的犧牲。我們進一步分析每一種類型的勞動參與「歷程」，發現主要的變化在於「中斷型」就業者離開勞動市場的年齡延後，而重返勞動市場的時間提前，顯示婦女中斷就業的期間逐漸縮短。

關鍵字：婦女就業類型、中斷就業、持續就業、世代

[†] 本文乃第一作者之碩士論文部分內容修改而成，感謝評審們的建議。文中謬誤由作者自負責任。

*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研究助理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Nan Hwa University

**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Nan Hwa University

收稿日期 2003/10/30，修訂日期 2004/02/03、2004/03/24、2004/04/24，接受刊登 2004/05/17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Women’s Marriage, Fertility and Employment Surve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itional patterns of female employment after World War II in Taiwa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tterns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have been quite stab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conventional and interrupted employment patterns, while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decreased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at means married women in the present still value family more than work. Seeking employment before getting married is a must done affair and once a family is formed, personal career could be given up, or at least given up for a period.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life courses on female employment, the major change is found within the category of interrupted employment, in which married women quit from the labor market later and re-entry earlier. The duration of employment interruption for married women is shortening.

Key Words: Patterns of female employment, interrupted employment, continuous employment, cohort

壹、前 言

戰後五十多年來，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持續不斷上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1 年「人力資源調查報告」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婦女勞動參與率從 1978 年的 39.1%，上升到 2001 年的 46.1%，女性勞動力佔總勞動力人數達 40.5%。晚近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的趨勢開始減緩，主要是因為高等教育大幅擴張，使得年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之故，若從年齡別勞動參與率來看，上升的趨勢仍一直持續，只是相較於男性以及歐洲國家，仍有相當的上升空間。

婦女勞動參與率的上升，與經濟環境變遷、人力資本的增加、以及兩性觀念的改變等因素有關。雖然兩次大戰時期，女性就業是為了解決男性前往戰場後所產生之勞力不足問題，卻也開啓了婦女就業的契機。而隨著經濟發展，第三級產業比重愈來愈高，社會對女性勞動力需求增加，提升了婦女勞動參與機會 (Pampel and Tanaka, 1986)。台灣也有類似的發展歷程，1970、80 年代，台灣從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勞力密集工業提供了許多女性就業的機會；90 年代後，服務業部門快速成長，吸引了更多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相對於男性，經濟成長對女性勞動供給的影響甚為明顯 (李誠，19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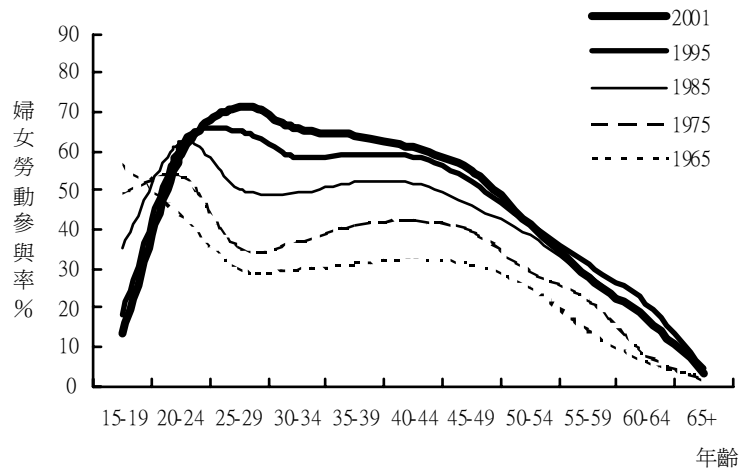
女性人力資本的提昇，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促使婦女參與勞動的另一個推力。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使得女性得以延伸工作領域，擴展職業層級；另一方面，也使其退出勞動市場之機會成本增加，延長女性持續勞動的時間。女性的職業市場或許與男性有一些隔離存在，但人力資本的影響力基本上仍然相同：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工作年資越高的女性，獲得的薪資也愈高 (張昌吉，1992；Schumann et al., 1994)。一旦女性薪資提高，其退出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 (Leibowitz, 1974)，越不容易在婚後離職 (Sorensen, 1983；張晉芬，1996)，即使生育後退出勞動市場，重返的可能性也越大，且時間較早 (McLaughlin, 1982；蔡青龍，1988；薛承泰，2000)。

在經濟發展與婦女人力資本提昇之外，性別角色態度的轉變也扮演重要角色。性別角色認定與期待會影響婦女勞動參與的意願與行為 (Lu, 1993)，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教育普及，傳統社會形塑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方式已有所修正；兩性平等觀念逐漸抬頭，家庭不再是婦女生活唯一的重心，性別角色刻板化印象的式微也減低了對婦女外出工作的阻力 (Bielby and Bielby, 1984)。Thomton et al. (1983) 的研究指出：自 1970 年代起，美國社會對婦女角色觀念益趨平等，促進了婦女參與勞動市場，Alwin et al. (1992) 分析英、美、德國的資料也指出：大部分男性與女性均同意婦女外出工作，只是當加入了家裡有學前兒童之條件時，大部分受訪者的態度卻轉為不同意，可見家庭因素的影響似乎仍凌駕於個人態度之上。

換句話說，社會經濟的變化提供了婦女勞動參與的舞台，婦女本身人力資本增長提昇了其勞動參與的表演技能，但家庭（尤其是兒童照顧）仍是左右勞動「劇情」的重要因素。長久以來，婦女就業一直受到所處家庭階段的影響，需要因應不同家庭生活歷程 (family life course, 早期使用 life cycle 一詞，中文譯為生命週期) 而調整，尤其是結婚與生育之歷程。因此，除了勞動參與率水準的高低之外，婦女在不同生活歷程上的勞動型態（如全時工作或部分時間工作）與過程（如退出再進入），也經常是討論焦點，以突顯婦女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衝突。台灣雖然數十年來婦女勞動參與率持續上升，但僅從總體資料數量上的增加，我們無法掌握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變化情形，例如從歷年（1965-2001）年齡組別之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圖 1），我們可以發現早期的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約呈 M 字型雙峰分配，中間的下凹部分常被解釋為因婚育造成中斷就業的結果；晚近則逐漸朝向單峰分配發展，一般認為乃是教育擴張使得女性的人力資本提昇，中斷就業的機會成本提高之故。然而圖 1 其實不能代表女性真正的勞動參與歷程，因為圖 1 中每個年齡組人口是不同世代 (cohort, 或譯為年輪) 的人口。當我們討論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時，指的是一個（或一群）女人一生的勞動參與；欲呈現真正的勞動參與歷程，須以世代的角度觀察追蹤一群同時出生的婦女，記錄其勞動參與歷史，才能得知其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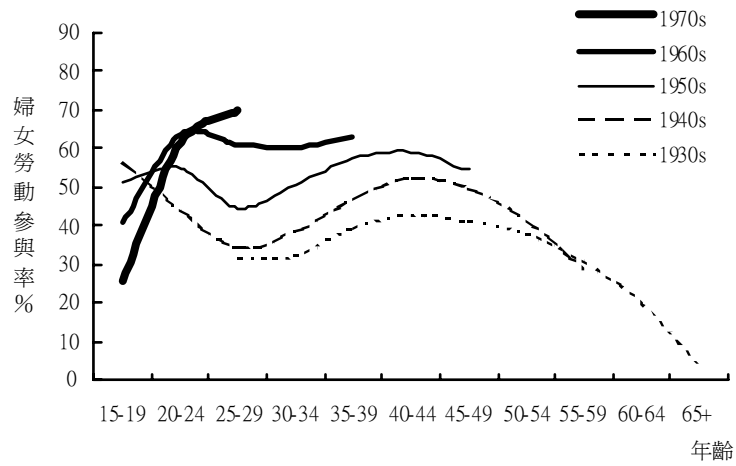
在國內缺乏相關長期追蹤資料的限制下，我們使用時期別總體資料來組合世代別婦女一生的勞動參與歷程。由於年齡（Age）、時期（Period）與世代（Cohort）三者間具有 $C=P-A$ 的形式關係，因此可以將時期別資料轉換為出生世代別資料，例如 1946-50 年出生的女性在 1970 年時是 20-24 歲，我們就以 1970 年 20-24 歲組的婦女勞參率作為該群女性勞動參與情形的代表；到了 1980 年時，她們的年齡對應為 30-34 歲，就以 1980 年 30-34 歲組的勞參率作為當時總體勞動參與情形的指標，其餘依此類推。轉換後的情形如圖 2，由於我們取得的時期別資料期間為 1965-2001 年，因此 1930 年代出生的世代，其勞動參與率的鋪陳只能自 25-29 歲組開始，爾後隨著出生年代往後推移，可得的起始年齡別資料也依序往前推移；而高年齡組資料面臨的情況恰好相反，例如 1960 年代出生的世代必須截斷於 35-39 歲組，而 1970 年代出生的世代則必須截斷於 25-29 歲組。雖然如此，圖 2 仍可呈現不同世代間的變化趨勢，我們可以發現不同世代女性勞參率的變化均呈現雙峰分配，只是峰谷的深度有縮小的趨勢，但峰谷是否會消失而終呈單峰分配其實仍不明確。

圖 2 同時說明不同世代間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1930 年代出生的婦女雖然缺乏 15-19 歲組的資料，我們相信其與 1940 年出生的世代一樣，均以 15-19 歲為勞動參與的第一個峰點。1950 年代以後出生之世代則因為教育普及與教育擴張之故，使得 15-19 歲組的勞動參與率明顯下滑，第一個峰點移至 20-24 歲。25-29 歲長期以來一直是婚育的高峰期，婦女勞動參與率乃在此處快速下降；不過圖 2 同時顯示峰谷年齡正在往後移動當中，對 1960 年代出生的婦女來說，峰谷期間已從 25-29 歲組蔓延到 30-34 歲組，正好對應晚婚與生育率下跌的趨勢。與已婚女性相較，未婚女性因缺乏另一半的經濟支持，必須持續參與勞動以獲得經濟來源，而子女數量縮減使得生育對婦女就業的影響期間縮短，婦女再就業的時間得以提前，如此一方面延後退出勞動市場，一方面加快返回勞動市場，乃使得峰谷的跌幅降低，而蔓延的期間拉長。



資料來源：歷年「人力資源調查」，行政院主計處。

圖 1 歷年時期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



資料來源：同圖1。

圖 2 歷年出生世代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

從圖 2 的變化趨勢即可了解圖 1 單峰分配的由來：當年輕世代的低年齡組人口（25-29 歲）尚未完全退出勞動市場，而年長世代接續年齡的婦女（30-34 歲組）已開始二次投入勞動市場，乃使得時期別資料（圖 1）中的 25-34 歲組的峰谷消失。換句話說，當世代別的勞動參與歷程產生變化時，有時並不能在時期別資料上真正反映出來。鑒於婦女婚育史與工作史資料（panel data）的缺乏，國內針對婦女就業類型與歷程的研究並不多，且多為單一時期別分析（簡文吟、薛承泰，1996；簡文吟，1997），無法看出就業類型與歷程的變化情形¹。由於不同世代間有不同的人口特徵，受不同時代背景及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如教育普及與教育年限延長延後了女性的初婚年齡，進而影響後續家庭生活歷程階段發生的時間與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時機，因此跨時期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描繪與比較才能看出變遷情形。本文將使用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分析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之變遷，呈現台灣婦女勞動參與變遷的另一個風貌。

貳、婦女就業型態與歷程

家庭生活歷程（family life course）²的概念早期由鄉村社會學家 Lomms and Hamilton（1936）提出，主要包括婚姻、養兒育女、子女離家至婚姻解組等重要事件；Glick（1947）是最早界定家庭生活階段內容者，其所劃分的家庭階段依序為：初婚、第一個子女出生、最後一個子女出生、第一個子女結婚、最後一個子女結婚、夫妻之一死亡、另一位夫/妻死亡。雖然此一「標準」歷程受到許多批評，但爾後的相關研究多仍以此為基礎來擴張與修正，而有關於家庭歷程與婦女勞動參與之討論，則多數停留於前面兩個階段，特別是生育的影響。

¹ 部分研究以受訪者年齡作為不同世代的界定，以比較不同世代婦女就業類型的差異。但婦女就業類型的認定受限於整個就業過程的長短，會受到勞動者年齡的影響，因此在不同年齡組當中比較就業類型的分布可能產生偏誤（薛承泰，2000）。我們將在分析方法中說明如何透過樣本的選擇來避免此一限制。

² 早期使用 family life cycle 一詞，中文翻譯為「家庭生命週期」。有關此一名詞意義之討論，可參閱楊靜利與劉一龍（2002）。

就結婚與生育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來看，整體而言，已婚者的勞動參與率低於未婚者，只是兩者間差異已逐漸縮小（劉鶯釧，1994），且相較於單身者（包括未婚、喪偶及離婚），已婚者有較高的離職機率（Felmlee, 1984）。Waite（1980）指出初婚及生育年齡越大者，在子女出生後越不傾向就業，可能是因為累積了較多的經濟資本，使得其在生育後得以選擇離開勞動市場，全心照顧家庭；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晚婚導致生育步調縮短而增加了妻子的就業困難。但初婚年齡越高，也可能代表有較長的工作經驗，累積了較多的人力資本，因而減低了因結婚而離職的機率（張晉芬，1996）。

生育對婦女就業決定的影響，以往研究結果甚為一致，幼年子女數越多，代表子女照顧負擔越重，越不利其就業（Waite, 1980；Felmlee, 1984；Leibowitz and Klerman, 1995），並形成離職婦女再就業的阻力（蔡青龍，1988；薛承泰，2000；Joesch, 1994；Barrow, 1999）。雖然家庭照顧責任對婦女就業是股阻力，但是家庭中若有其他家人分擔婦女的家務與子女照顧時，則有助於其投入勞動市場（單驥、陳圳忠，1990；呂玉瑕，1997）。相對於中斷的就業型態，部分婦女能持續就業，可能是因為她們在婚育後投身非正式工作（以無酬家屬為主要內涵）或兼職工作，或由於婚後投入夫家的家庭企業，才得以有不中斷的就業生涯。此種持續就業可說是家庭角色的延伸（Lu, 1992；伊慶春、簡文吟，2001）。除了婦女個人人力資本與婚育因素外，家庭的經濟狀況以及丈夫對妻子就業的態度也是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因素。部分研究以丈夫的教育程度或收入做為衡量家庭經濟狀況的指標，結果指出丈夫收入或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於妻子就業，即使中斷就業，退出的時間較晚，復職的機率也越高（McLaughlin, 1982；Dooley, 1994；Leibowitz and Klerman, 1995；簡文吟，1997；薛承泰，2000）。

事實上，婦女的就業選擇並非全有或全無，部分婦女以半職工作做為兼顧家庭與工作的第三種選擇，因此有關婦女就業「型態」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引起部分學者的重視。半職工作者在歐洲國家已佔有相當比例（Blossfeld and Rohwer, 1997；Rosen and Sundstrom, 2002），且成為部分女性在生育後得以持續

工作的管道 (Klerman and Leibowitz, 1999)。但在台灣，女性半職就業者僅佔整體就業者比例約 10%，且多集中於 50 歲以上的婦女 (劉鶯釧, 1994)，反映出國內對於兼職工作的需求較少，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婦女就業的選擇。Drobic et al. (1999) 以家庭生活歷程為參考架構，以事件史分析方法檢視已婚女性在全職、半職與不工作三者間的轉變機率，來說明婦女就業型態的轉變。其研究指出：進入婚姻階段後，美國女性就業率下降主要原因在於結婚提升了女性從全職/半職工作轉入不工作的機率，並降低了婦女再就業的機率；進入生育階段後，年幼兒女數不利於婦女從無工作進入全職/半職工作，而學齡子女數卻有正向作用，隱含著幼年子女照顧需求的降低以及子女進入學齡階段後經濟壓力的增加促使了未就業女性再度投入勞動市場。

由於婦女經常因為婚育而進出勞動市場，婦女一生的工作歷程就顯得相當多樣。Sørensen (1983) 乃根據已婚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時機，將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區分為傳統型、中斷型、雙軌型與不穩定型四種 (如表 1)，其中中斷型與雙軌型包含了曾於結婚或生育時退出勞動市場，兩者的區分在於復職時間是在最後一胎出生後或出生前，雙軌型的意義在於強調婦女能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反映出已婚女性突破性別角色專一化的限制。

表 1 Sørensen (1983) 的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分類

勞參類型	勞參歷程
傳統型	結婚時退出勞動市場，之後未返回 生育第一胎時退出勞動市場，之後未返回
中斷型	結婚時退出勞動市場，在最後一胎出生後返回 生育第一胎時退出勞動市場，在最後一胎出生後返回
雙軌型	婚育期間從未退出勞動市場 結婚時退出勞動市場，在最後一胎出生前返回 生育第一胎時退出，在最後一胎出生前返回
不穩定型	多次進出勞動市場 生育第二胎或更晚胎次時才離開勞動市場 其他

資料來源：Sørensen (1983)

由於結婚、生育以及就業三者均非固定不變的狀況，婚姻及生育的時機與步調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所處的家庭生活歷程階段，一方面也影響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時間，相互堆疊乃形成特定時期上不同的年齡別婦女勞動參與率，而如果觀察的角度從時期別移到時間軸上，則為就業歷程各階段長短的變化。

欲呈現完整的女性就業歷程（包含特定歷程不同階段上的時間長短），必須長期觀察女性一生的勞動參與情形，但台灣有關婦女婚育與就業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付之闕如，因此過去的研究多以就業型態來概括不同的就業歷程。例如簡文吟與薛承泰（1996）使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探討已婚婦女就業型態影響因素。該文將已婚婦女在「婚前至最小子女尚未入小學前」的就業情形區分為連續就業、生育中斷、結婚中斷與從未就業四種就業類型，結果顯示早婚易將女性推離勞動市場，生育子女數與連續就業的機率成反比，而與中斷就業的機率成正比。但該文的討論僅限於「有學齡前子女」婦女的就業型態，無法看出子女就學後所反映已婚婦女家庭責任比重改變對其是否（再）就業的影響，對於婦女就業歷程的捕捉較有限。此外，限於單一時期別資料，也無法掌握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長期變遷趨勢。而伊慶春與簡文吟（2001）則利用回溯資料，針對已婚婦女在「婚前至最小子女上小學前」階段的就業情形來區分就業型態，結果顯示有 40% 左右的已婚婦女得以持續就業，但進一步探究其持續就業內容，發現有將近一半是藉由非正式就業或兼職工作才得以持續就業。此外，考量配偶之工作屬性後，可看出已婚婦女的持續就業仍是因應家庭需求而採取彈性就業所致，似乎顯示無論是中斷就業或持續就業，家庭需求的重要性仍大於個人職業生涯與自主性的考量。

上述研究突顯出家庭生活歷程與婦女就業型態與歷程的密切關連，然無論是家庭生活歷程、就業型態、就業歷程，在步調上以及內容上均可能隨社會變遷而產生變化，因此長時間的變遷情形值得進一步探究。另一方面，在教育擴張、結婚年齡延後等變遷趨勢的影響下，不同世代女性家庭生活歷程的步調將產生變化，可能進一步影響女性的就業歷程，國外的研究也已有實證研究指出

婦女就業歷程的變化會受年齡、時期以及世代效果的影響(Blossfeld and Rohwer, 1997; Drobnic et al., 1999)，因此本文將針對此一變遷情形進行探討，以年齡為參考點，描繪出不同世代婦女結婚、生育與就業的步調，以呈現台灣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

參、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婦女一生的勞動參與歷程必須透過長期追蹤資料才得以獲知全貌，此類資料的蒐集不易，且在目前國內沒有婦女勞動參與長期追蹤資料的情形下，本文以不同年期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資料，分析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遷。

一、資料來源

國內目前有關婦女勞參行為較完整的個體性資料當屬行政院主計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該項調查提供有關台灣地區婦女結婚、生育以及勞動參與資料，調查對象為十五歲以上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女性人口。自 1979 年起至 1988 年間每年隨同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辦理。但之後由於經費限制改為不定期辦理，於 1990 年、1993 年與 2000 年分別各舉辦過一次。為反映社會變遷下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我們選取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樣本資料來說明變遷的情形。

二、分析方法

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問卷中有關婦女勞參歷程及婚育史的紀錄是以回溯性方式調查。考量年輕受訪者尚未經歷完全的婚姻與生育歷程，納入分析可能產生選擇性偏誤的問題（如尚未生育者不會勾選因生育中斷的勞參類型，但未來可能因生育而中斷就業），故本文僅選取 40-49 歲年齡組為研究對象。選取此年齡組的原因在於 40 歲以後，大多數女性已完成婚育，其勞參歷程與家庭生活週

期能較完整地紀錄。將年齡截斷於 49 歲一方面是考慮足夠樣本數，另一方面則是避免因年齡組距加大而產生年期效果的影響。換句話說，三個時期的樣本分別代表 1931-1940，1941-1950，1951-1960 三個出生世代的女性，而她們的工作年齡正值台灣光復後社會變遷的進程，透過三組世代的比較分析，相信能反映出社會變遷下婦女勞參類型的變化（樣本特徵如附表 1）。

至於勞動參與類型的分類上，為避免過細的分類造成樣本數過少與比較的困難，因此本文僅針對問卷中有關婦女勞動參與歷史的十一個選項區分為四類勞參類型，如表 2，其中正號 (+) 代表有參與勞動市場，負號 (-) 代表沒有參與勞動市場。

表 2 台灣婦女勞動參與類型分類

婚前	結婚	生育	受訪時	勞參歷程	勞參類型	
+	-	-	-	+	曾因結婚離職，現有工作	中斷型
+	+	-	-	+	曾因生育離職，現有工作	
+	-	-	-	+	曾因其他原因離職，現有工作	
+	+	+	+	+	婚前至今一直有工作	持續型
-	+	+	+	+	婚前未工作，婚後至今一直有工作	
+	-	-	-	-	曾因結婚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	傳統型
+	+	-	-	-	曾因生育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	
-	-	-	-	-	婚前至今一直未工作	
+	-	-	+	-	曾因結婚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其他
+	+	-	+	-	曾因生育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	-	-	-	-	曾因其他原因離職，至今未工作	

說明：1. 離職的定義為離開勞動市場連續超過三個月以上。

2. 部分女性可能因為家庭經濟需要而於生育後才投入勞動市場，但在問卷中並無「婚前未工作，生育後才工作」的選項，筆者猜測此歷程的樣本可能包含於「婚前未工作，婚後至今一直有工作」的選項中。

為了進一步呈現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時機與步調，我們選擇曾結婚且子女數目大於零者，針對各勞動參與類型分別計算三個年期受訪者受教年數、初婚年齡、初婚至復職期間（曾中斷離職者）之平均數，來組合不同世代婦女一生

的勞動參與歷程；不過由於樣本限定於 40-49 歲受訪者，故僅能描繪出受訪者 49 歲前的勞動參與歷程。

各種勞動參與類型的歷程均從受訪者就學時間開始計算，首先根據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換算成教育年限，再加六（假設六歲入學），視為其畢業年齡。其次將受訪者初婚年齡及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分別作為「因結婚離職者」與「因生育離職者」離職時機的標的年齡，若因婚育離職後有再復職者，則依據問卷中「因結婚/生育離職後多久復職」問項計算離職至復職年數。例如：因結婚中斷就業後再復職者，我們將其初婚年齡視為其離職的時機，再根據其「因結婚離職多久後復職」計算其離職至復職的時間。因生育中斷就業後再復職者的勞參歷程計算方式與前者類同，不過因離職胎次不一，在大部分樣本是於第一胎離職的情況下³，在此視第一胎生育時間為離職的時機，再根據其「因生育離職多久後復職」計算其離職至復職的時間。

肆、研究結果

在婦女勞動參與類型方面，我們主要看各類型在不同時期間的消長情形；在婦女勞動參與歷程方面，則檢視不同歷程各階段時間長短的變化。

一、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

就表 3 三個世代的勞動參與類型分布比例來看，傳統型有減少趨勢，其中「婚育離職後未返回工作」者的比例有小幅上揚，因結婚離職未復職者比例高於因生育離職未復職者，似乎顯示前者再就業的可能性較後者低，此與薛承泰（2000）的研究結果類似。「從未工作」者的比例隨世代推移呈大幅降低趨勢（年長世代有 38.5% 的已婚婦女從未工作，年輕世代僅有 7.9%）。中斷型呈現增

³ 1990 年與 2000 年資料顯示，曾因生育離職者曾經於生育第一胎時離職的比例分別為 79.6% 與 80.2%，1980 年資料則無受訪者離職胎次資料，僅能得知其生育第一胎之時間。

表 3 台灣地區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變遷：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

勞參歷程類型	1980	1990	2000
未婚、現有工作	0.4	1.4	2.7
未婚、現無工作	0.3	0.5	1.4
已婚			
傳統型	49.2	40.0	32.6
因結婚離職，至今未工作	8.4	14.1	18.5
因生育離職，至今未工作	2.3	4.1	6.2
婚前至今一直未工作	38.5	21.8	7.9
中斷型	2.7	8.2	19.7
因婚姻中斷，現有工作	1.1	4.8	9.2
因生育中斷，現有工作	0.9	2.2	8.3
其他原因中斷，現有工作	0.7	1.2	2.2
傳統型 + 中斷型	51.9	48.2	52.3
持續型	42.3	44.1	34.9
婚前至今一直有工作	30.8	34.8	29.5
婚前無，婚後至今一直有工作	11.5	9.3	5.4
其他	5.1	5.8	8.7
曾因結婚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0.3	0.8	1.9
曾因生育離職，且曾恢復工作，現未工作	0.6	0.7	1.4
曾因其他原因離職，至今未工作	4.2	4.3	5.4
已婚人口小計	99.3	98.1	95.9
女性人口總計	(N=3620)100	(N=3850)100	(N=5418)100

資料來源：1980、1990、200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原始資料，40-49 歲樣本。
說明：數值單位為百分比數，經加權計算。

加的趨勢，但變化的幅度不大。其中因婚育或其他原因中斷就業，之後又再投入勞動市場者的比例均小幅上升。持續型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方面，年長世代中有 42.3% 的已婚婦女持續就業，年輕世代則為 34.9%；主要是「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比例下降所致，而「婚前至今持續工作」者的比例則變化不大。

如果婚育對婦女勞動參與的影響減小的話，婦女就業類型的變遷趨勢預期會呈現傳統型與中斷型減少而持續型增加的情形；然而，將傳統型與中斷型兩類合併計算，二十年來皆佔了一半左右的比例，持續型反而有下降趨勢。整體而言有約一半的已婚婦女仍受婚育因素影響而維持以往的就業型態。

從縱的方向來看，年長世代之就業型態以從未就業以及連續就業為主，中斷型的比例不高。年中世代婦女，一生從未就業者比例僅佔五分之一左右，持續就業的比例則稍有增加。年輕世代不到一成女性從未就業，持續就業佔了三成五。此與先前國內研究結果相似（簡文吟、薛承泰，1996），顯示婦女就業型態與台灣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背景有關；1960-80 年代初期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以及 80 年代以後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的興起，吸納不少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工作地點與家庭的分離，使已婚女性難以同時兼顧兩者，加上彈性工作機會的增加，使得中斷就業的型態增加。這也對應著附表 1 中，婦女婚育前從業身份比例的變化，無酬家屬工作者明顯減少，而受私人雇用者的比例明顯增加。顯示婦女就業內容的變遷可能是促成持續型就業比例下降而中斷型就業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

綜合而言，二十年來最主要的變化是從未工作者的比例大幅下降，「從未工作」者逐漸轉向「婚育離職後未重返勞動市場」以及「婚育離職後重返勞動市場」的勞動參與類型。換句話說，一生都沒工作的女性減少了，但不是轉為持續型，而是在婚育前工作，或是婚育後工作。顯然對此三個世代的婦女而言，家庭仍是主要的生活重心，而工作與否是配合家庭需求而做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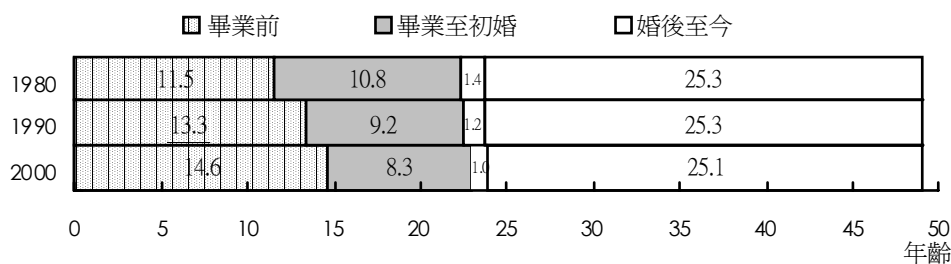
二、婦女勞動參與歷程的變遷

表 3 顯示「其他」類型所佔的比重很低，現有資料亦無法呈現其歷程變化，因此以下主要討論傳統型、中斷型與持續型三種勞動參與歷程的變化。

（一）傳統型勞動參與歷程

從圖 3 與圖 4 傳統型就業型態者勞參歷程步調的變化⁴可看出因為教育水準的提高使得晚近世代婦女參與勞動市場的時機延後，但「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

⁴ 圖 3 至圖 8 灰階部分代表參與勞動市場，白色部分代表未參與，數值以年為單位。各歷程樣本數如附表 2。



說明：圖中 1.4 年、1.2 年、1.0 年期間分別代表各世代「初婚至初育期間」。

圖 3 「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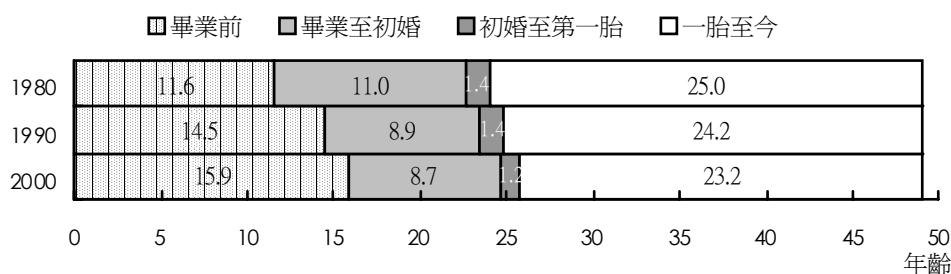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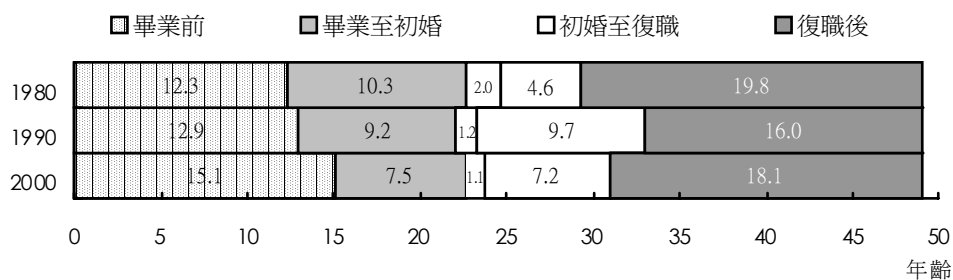


圖 4 「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者的初婚以及生育的年齡並未明顯隨之延後，三個世代的婦女均約略在 23 歲退出勞動市場，之後未再進入。「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年中及年輕世代的初婚以及生育年齡有較明顯的延後，年長與年輕世代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分別為 24.0 歲及 25.8 歲，受到生育年齡延後的影響，使得「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退出勞動市場的年齡延後。比較「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者與「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的平均教育程度，我們可以發現三個世代「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者的平均教育程度均較「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者的平均教育程度來得高，教育程度似乎能夠延後退出勞動市場的時間。

(二) 中斷型勞動參與歷程

由於中斷型的年長世代樣本數量太小（因婚姻中斷者有 29 個，因生育中斷者有 32 個），因此我們主要針對 1990 年與 2000 年的資料進行比較，但仍於圖形上標示其歷程。「因結婚離職後復職」者（圖 5），兩個世代的初婚年齡沒有明顯差異，約略在 22 歲退出勞動市場。復職年齡則年輕世代（30.9 歲）較年中世代來得早（33 歲）。「因生育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步調的變遷情形也有類似的發展（圖 6），年中世代因生育退出勞動市場的時機較年輕世代來得早（分別為 23.6 歲、24.3 歲），復職時間則年中世代較晚（年中與年輕世代分別為 32.6 歲、31.7 歲）。比較年中與年輕世代的資料可看出，年輕世代較年中世代晚進入勞動市場，而較早返回勞動市場，因婚育中斷就業的期間確實隨世代的變遷而縮短了。若不考慮年長世代的資料（樣本數不足），可看出離職婦女約略在離職後十年左右復職，與薛承泰（2000）的研究結果類似，隱含著子女達學齡後，幼兒照顧負擔減輕，使得部分婦女得以再度就業。同樣比較圖 5 與圖 6 的平均教育程度，同樣發現「因生育離職後復職」者的平均教育程度較「因結婚離職後復職」者的平均教育程度來得高，再次印證教育程度促使延後退出勞動市場的時間。



說明：圖中 2.0 年、1.2 年、1.1 年期間分別代表各世代「初婚至初育期間」。

圖 5 「因結婚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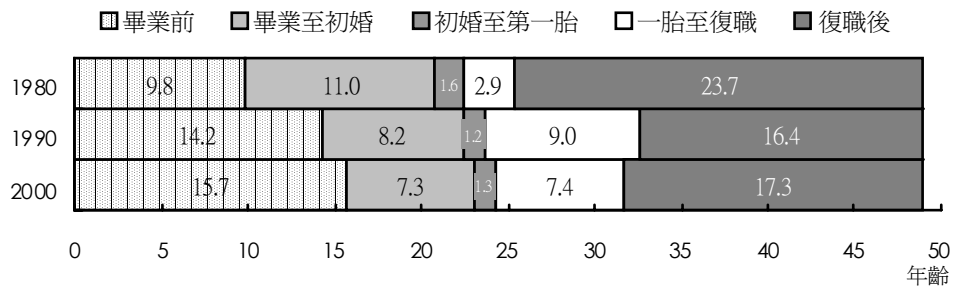


圖 6 「因生育離職後復職」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三) 持續型勞動參與歷程

圖 7 與圖 8 為持續型就業者的勞動參與歷程變遷情形，與其他勞參類型相同，由於平均教育年數的提升而延後進入勞動市場，而「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的圖型顯示年中世代與年輕世代較年長世代提早進入勞動市場。圖 7 與圖 8 二者的關係與前面兩組的關係不同，不是區分因為結婚或生育而退出勞動市場者之差異，而是區分婚前有無工作者之差異，因此圖 7 與圖 8 的平均教育程度之比較就產生不同的意義。「婚前至今持續工作」者的平均教育程度明顯地較「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的平均教育程度來得高，似乎隱涵著前者的持續工作有較多的「機會成本」或「自我實現」的考量，後者的持續工作則相當程度是來自於「經濟壓力」。將平均教育程度的比較擴展到所有類型上，可以輔證此一推論。不論是就那一個世代來看，「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的平均教育程度幾乎都是最低的。她們在婚前可能因為操持家務需要或性別分工的觀念而沒有進入勞動市場，婚後則因經濟壓力不得不持續參與勞動以貼補家用。換句話說，女性參與勞動可能是「選擇」的結果，也可能是「不得已」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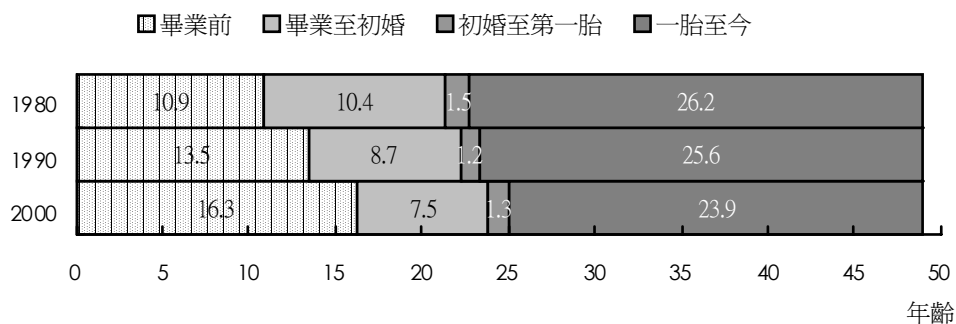


圖 7 「婚前至今持續工作」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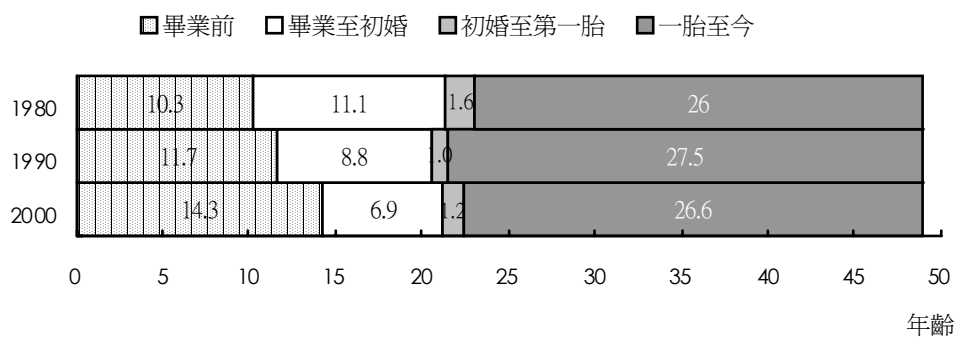


圖 8 「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勞動參與歷程之變遷

伍、結 論

無論就婦女勞參率的變化或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來看，都顯示出婦女勞動參與的多樣性與動態性。早期有關婦女勞動參與的研究多著重於婦女勞動參與數量上增加的原因，晚近則將焦點移至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過程及就業型態（蔡青龍，1988；劉鶯釧，1994；薛承泰，2000；伊慶春、簡文吟，2001）。

然而，由於國內缺乏婦女勞動參與之貫時性資料，多數研究僅能從橫斷面或回溯性資料中建構出婦女的勞動參與型態。本文擴展以往的研究，嘗試透過三個年期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的回溯資料來呈現婦女勞動參與類型與歷程的變化。我們以1980年、1990年與2000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個體資料進行分析，為了包含完整的家庭生活歷程與勞動參與歷程，乃將樣本限定於40-49歲的已婚女性，如此除了可以對照不同出生世代者勞動參與情形的差異，也可減少年齡分布過廣產生之年齡效應的干擾。

研究結果顯示，在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方面，近二十年來傳統型與中斷型兩者合計佔了一半左右的比例，持續型的比例並未隨著女性平均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子女數減少、工作時間與機會的增加而上升。所以婦女勞動參與類型的變遷主要在於傳統型與中斷型之間的消長。傳統型雖然有相當的下跌幅度，但主要的下跌來源是婚前至今從未工作的比例大幅下降，婚育後未再參與勞動者的比例反而有上升的趨勢，這可能是婦女勞動參與率一直無法持續突破的關鍵所在。顯然家庭生活歷程仍深深影響婦女的就業型態，就業在組織家庭之前是必要的，一旦成家之後，工作即可以或者必須犧牲，至少是短暫的犧牲。

另外，我們也針對不同就業歷程者，回溯計算其結婚、生育第一胎與進出勞動市場的時間，描繪不同世代婦女勞參歷程的變遷情形。總括而言，各歷程的主要變化在於晚近世代延遲離開勞動市場且較早重返勞動市場，因婚育中斷就業的期間縮短了，此與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應有相當大的關係，也就是女性教育程度提高使其離開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上升，也促使女性開始思考自己的職業生涯，尋求家庭角色之外的「自我實現」。但另一方面，「婚前無工作，婚後持續工作」者的平均教育程度是所有歷程中最低的，顯示女性就業不一定是「機會成本」上升與「自我實現」追求的作用，部份可能是「經濟壓力」下不得不的選擇。

最後，需要提醒的是，本文資料只能代表1931-1960出生世代的就業歷程變

化情形，更晚近世代的變遷情形為何，還有待觀察。另一方面，由於資料的限制，使得此一議題的研究仍有許多發展的空間，值得進一步探討。我們雖然使用回溯資料捕捉不同世代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的變化情形，但「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問卷其實並未詢問受訪者確切離職時間，我們乃分別以初婚年齡以及生育第一胎年齡作為其離職年齡參考點，計算受訪者初婚年齡、生育年齡與復職年齡的平均數，再計算其就業／離職／再就業期間（*duration*），如此對於實際上婦女進出勞動市場確切時間點的掌握仍難免產生誤差。而對於左右這些變遷趨勢的原因也因為資料的限制而無法進行驗證性的探討。雖然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問卷中能夠取得受訪者職業、子女數、配偶職業、家庭經濟等訊息，但這些訊息乃是受訪者「受訪當時」的狀況，無法反映婦女勞動參與歷程中的變化。由於就業歷程是動態的過程，且受到婦女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結構背景等因素的影響，未來十分需要蒐集長期追蹤調查資料，以釐清相關變項間的關係，並對女性勞動類型與歷程有較完整的掌握。

附表 1 1980 年、1990 年與 2000 年 樣本特徵

樣本特質	1980	1990	2000
教育程度	N=3620	N=3850	N=5418
國小及以下	88.2	71.8	43.4
國中	6.4	9.7	18.6
高中(職)	3.4	11.4	26.4
大專及以上	2.0	7.1	11.6
平均教育年數	4.6	6.8	9.0
婚姻狀況	N=3620	N=3850	N=5418
未婚	0.7	1.9	4.2
有偶(含同居)	93.1	89.1	87.0
離婚、分居	1.4	3.4	4.4
喪偶	4.8	5.6	4.4
初婚年齡	N=3596	N=3776	N=5193
未滿 20 歲	26.0	24.3	17.5
20 至 24 歲	61.0	56.7	52.8
25 至 29 歲	11.1	16.0	24.2
30 歲以上	1.9	3.0	5.5
平均初婚年齡	21.4	21.9	22.9
子女數目	N=3596	N=3776	N=5193
0 個	1.6	1.8	2.2
1 至 2 個	10.0	26.4	45.0
3 至 4 個	47.7	59.5	49.5
5 個以上	40.7	12.3	3.3
平均子女數目	4.3	3.1	2.6
婚(育)離職前職業	N=638	N=1238	N=1273
白領人員	12.5	20.4	29.6
買賣及服務人員	21.0	20.7	12.7
農林人員	30.6	16.1	6.1
生產、操作及體力工	35.9	42.8	51.6
婚(育)離職前從業身份	N=638	N=1238	N=1273
雇主及自營作業者	5.8	5.9	4.0
政府雇用者	8.5	8.5	4.6
私人雇用者	55.8	67.8	84.2
無酬家屬工作者	29.9	17.8	7.2

資料來源：1980、1990、2000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原始資料，40-49 歲樣本。

說明：1. 數值單位為百分比數，經加權計算。

2. 初婚年齡及子女數目數值之計算排除未婚樣本。

3. 平均教育年數是由教育程度轉化計算而得，不識字：0 年，自修：3 年，小學：6 年，國中：9 年，高中職：12 年，大專及以上：16 年。

4. 白領人員包含行政及主管人員、專門性、技術性等相關人員以及監督及佐理人員。

附表 2 各類型勞動參與歷程樣本數

單位：人

勞動參與歷程	1980	1990	2000
傳統型			
因結婚離職後未復職	284	532	907
因生育離職後未復職	77	157	313
從未就業	1397	819	456
中斷型			
結婚中斷後復職	29	184	509
生育中斷後復職	32	83	420
持續型			
婚前至今皆有工作	1090	1311	1580
婚前無工作，婚後至今皆有	420	355	318
其他型			
結婚離職後曾復職，再退出	11	30	94
生育離職後曾復職，再退出	24	27	85
總計	3364	3498	4682

資料來源：1980、1990、2000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原始資料，40-49歲樣本。

說明：樣本的選取上多加了已婚且子女數目大於零者的條件限制，故本表與表3之樣本數有些許差異。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伊慶春、簡文吟（2001）已婚婦女的持續就業：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的妥協，*台灣社會學*，1：149-182。
- 李誠（1975）台灣勞動供給之初步分析，李誠編，*台灣人力資源論文集*，台北：聯經。
- 呂玉瑕（1997）助力與阻力之間：家庭互動關係與已婚婦女就業，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1-39，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 張昌吉（1992）我國勞工薪資所得與決定因素之分析，*勞動學報*，2：111-126。
- 張晉芬（1996）女性勞動者婚育離職原因之探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小型專題研討會第三回：台灣勞動研究，台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 單驥、陳圳忠（1990）台灣地區大小家庭結構對已婚婦女勞動供給的影響，*人口變遷與經濟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集*，255-276。台北：中研院經濟學研究所。
- 楊靜利、劉一龍（2002）台灣的家庭生活歷程，*台灣社會學刊*，27：77-105。
- 劉篤釧（1994）台灣的婦女勞動供給，梁國樹編，*台灣經濟發展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
- 蔡青龍（1988）婦女勞動再參與的初步分析，*經濟論文叢刊*，16(2)：149-174。
- 薛承泰（2000）台灣地區已婚婦女再就業時機的初步分析，*人口學刊*，21：77-99。
- 簡文吟（1997）台灣地區已婚婦女就業型態之分析：離職與復職的檢視，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文吟、薛承泰（1996）台灣地區已婚婦女就業型態及其影響因素，*人口學刊*，17：113-134。

英文部分

- Alwin, D., M. Braun, and J. Scott (1992) The separation of work and the family: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 Stat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 13-37.
- Barrow, L. (1999) An analysis of women's return to work decisions following first birth, *Economic Inquiry*, 37(3): 432-451.
- Bielby, D. V. and W. T. Bielby (1984) Work commitment, sex role attitudes and women's employ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2): 234-247.
- Blossfeld, H. P. and G. Rohwer (1997) Part time work in west Germany, In Blossfeld, H. P. and C. Hakim (eds.) *Between Equal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Women Working Part Time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65-20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oley, M. D. (1994) The converging market work pattern of married mothers and lone mothers in Canada,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2): 600-620.
- Drobnic, S., H. P. Blossfeld, and G. Rohwer (1999) Dynamics of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over the family life course: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1): 133-146.
- Felmlee, D. H. (1984) A dynamic analysis of women's employment exit, *Demography*, 21(2): 171-183.
- Glick, P. C. (1947) The family life cy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2): 164-174.
- Joesch, J. M. (1994) Children and the timing of women's paid work after childbirth: A further spec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6(2): 429-440.
- Klerman, J. A. and A. Leibowitz (1999) Job continuity among new mothers, *Demography*, 36(2): 145-155.
- Leibowitz, A. and J. A. Klerman (1995) Explaining changes in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over time, *Demography*, 32(3): 365-377.
- Leibowitz, A. (1974) Educa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women's time, in Juster, F. T. (ed.) *Education, Income and Human Behavior*, 171-197, New York: McGraw-Hill.
- Lomms, C. P. and C. H. Hamilton (1936) Family life cycle analysis, *Social Forces*, 15: 225-231.

- Lu, Y. H. (1992) Married women's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OC* 2(2): 202-217.
- Lu, Y. H. (1993) Sex-role attitudes and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a Detroit area study, *Journal of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4: 137-174.
- McLaughlin, S. D. (1982)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surrounding the first birt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2): 407-420.
- Pampel, F. C. and K. Tanaka (198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 reconsideration, *Social Forces*, 64(3): 599-618.
- Rosen, M. and M. Sundstrom (2002) Family policy and after-birth employment among new mothers: A comparison of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8(2): 121-152.
- Schumann, P. L., D. A. Ahlburg, and C. B. Mahoney (1994) The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and job characteristics on pa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9(2): 481-503.
- Sørensen, A. (1983)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s after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2): 311-321.
- Thornton, A., D. F. Alwin, and D. Camburn (198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role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211-227.
- Waite, L. J. (1980) Working wives and the family life cycl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2): 272-294.